

学术争鸣应遵守学术规范

——答易竹贤、陆耀东教授为《丰乳肥臀》的辩护

何 国 瑞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何国瑞(1933-), 男, 湖南资兴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摘 要] 易竹贤等教授完全不顾学术规范, 不敢就他们挑起的论争主题与何国瑞教授正面交锋, 本文无意多作论驳, 只略指出其学术上善变的特点。陆耀东教授也不敢正面交锋, 违反学术规范更甚, 对《丰》无一字分析, 即认定何的批评是“置人死地的冤案”, 说何“制造阶级斗争”。何引邓小平 1979 年来对国内文艺界自由化思潮及错误倾向的批评, 证明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三位教授为何不守辩论规则, 极力替《丰》辩护?

[关键词] 学术规范; 实事求是; 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035-08

关于《丰乳肥臀》,《武汉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发表了易竹贤、陈国恩教授的文章《再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和方法》(以下简称易二文), 同时还发表了陆耀东教授《关于〈丰乳肥臀〉论争的我见》(以下简称陆文)。仍因多种疾病缠身, 没能及时答辩。

仔细读了易二文后, 发现易竹贤教授竟完全违反辩论规则和学术规范, 这里只说主要一点: 论争缘何引起? 分歧焦点是什么?

我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社会主义文艺学》过程中, 先期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以下简称《歌》文)(刊《武汉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 其中在论述这些年来流行一种反对、否定革命的思潮时, 作为例证, 用三百多字评述了《丰》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易、陈发表了《〈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和方法》(以下简称易文)(《武汉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与我针锋相对, 赞赏《丰》“是社会主义文学”, 说它突破了传统的写法, “表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借此严厉批评我“僵化”, 硬说我主张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必须完美无缺, 反面人物则必须一无是处。易、陈认为“穷人中有恶棍, 富人中有圣徒”, 说我仍抱着过时的“工具论”不放, 等等。最后给我扣上一顶大帽子, 说我是“对历史的进步怀着疑惧和抵触情绪”的人。

我当时因脑梗塞等病, 一年内多次住院, 后来不得已才为文答辩:《评论〈丰乳肥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争》(以下简称答易文)(《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文章第一部分引述《丰》大量的描写,

揭示作者笔下,凡革命的无一好人,成了“穷人皆恶棍”;反对革命的大多被美化,几乎“富人皆圣徒”。据此我反问易,说《丰》“近乎反动”过分了么?并从理论上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断言《丰》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章第二部分着重指出易竹贤教授违反一般逻辑,仅凭主观推断,引不出我一字一句,硬给我扣上学术上、政治上种种帽子,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详细引证易教授不同学术著作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说明在《丰》上的分歧,不是由于我的僵化,而是由于易自己变得太快了。

按辩论规则,易等再写文章,本应围绕争论主题,丝丝入扣反驳我的答辩,以保卫他们的核心观点。然而,他们却绝口不再提《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了,只说了一句:“这里先不说《丰乳肥臀》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也不再质问《丰》“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

按规范,自己立论的基础都放弃了,再攻论敌,难免沦为无理诡辩。令人骇异的是,他们却继续批我“文学批评中的观念和方法”,而所批的竟又仍是他们毫无根据强加给我的、我已批驳了的东西,依旧诬称我坚持: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写他的缺点,否则就是对党的攻击,任何一个反动派,“那怕一点点善良之处”也不能写,否则“就是对反动派的美化”,“说到底坚持的还是‘工具论’文学观”,等等。

我在答易文中:(1)如前所述,已论证了《丰》的问题不是因为写了共产党员的某些缺点和写了反动派的点点善良,根本是它几乎专写共产党人如何如何坏和大写反动派怎样怎样善良。(2)我还就他们批评的“工具论”作了具体分析,简单的工具论不对,我也反对,从未宣传过;但马克思关于任何文艺都是人类的一种工具的思想,却是正确的,并作了较细的论述。易等为什么不敢在这些关键点正面交锋,却仍大批特批他们心造的幻影?他们似乎也有点心虚,不得不向读者交待一句:“何先生当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转而又断定:“这样的逻辑是贯穿在何先生文章中的。”真不知这叫什么论辩规则?易二文充满了这种不讲理的文字,我有必要再一一论驳么?

不过对易竹贤教授的某些自我辩护,我倒乐意再驳一下,以进一步证明他是如何不顾学术规范的。

(1)我在《歌》文指出,《丰》甚至从生理上丑化革命者和美化反面人物,一母所生,投奔了革命的五姐的乳房“宛如两座坟墓”,而投靠反动方面的大姐的乳房则是“清秀伶俐”的“上等品”,“闪耀着玉一样的滋润光泽”。易文为之辩护说,作者写两人乳房,“是从一辈子吊死在女人奶头上的小弟上官金童的视角出发的,显示的只是人的个体差异”。我在答易文中先是据实反驳,《丰》对革命者从生理上也加以丑化,“乳房”描写不是孤例。凡写到“公家人”,几乎都是“像猎狗”;“像一头暴怒的大猩猩”;“宛如一只大蛤蟆”;“头发像猪鬃”;“残忍得像狐狸”;整个人“像一根充了血的驴鸡巴”……。请问,难道革命者的“个体差异”就都“差”成禽兽一般!接着,顺其逻辑反问:如“金童视角”理论成立,“那么,这位只有几岁的上官金童对‘马童事件’所发出的攻击革命的评论,又作何辩解呢?那么,“鲁迅的《狂人日记》不就毫无意义了么?因它全是一个疯子的疯话。”最后,从理论上指出,凡作者在作品中所设置的一切,尤其是关键人物,无不体现作者的感情倾向乃至思想观念,并说这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中就给学生讲清楚了。

对此,易二文怎么辩护呢?对前两点不敢置答,只拈出最后“软”的一点,说它“多半是近半个世纪前流行的观点”,“所说的大学一年级的《文学概论》一定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出版的”。易文因我在《歌》文中从政治上批评了《丰》,就以奚落的口吻说:“这样的批评方式近年已属罕见。”我在答易文中反诘:“以是否罕见或流行来判断是非,这究竟是搞学术研究,还是搞时髦评比?”易竹贤教授大概受这种“时髦观”影响较深吧,所以才会反复以此来判断学术是非和批评别人了。

判断一个文学观点是否正确,只能看它是否反映了文学某方面的规律。凡人创造的一切,无不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人总是根据目的精心设置一切。君不见一个人装修住房,贴什么墙纸,安什么灯,尚且要一一仔细考虑,以满足自己的实用和体现自己的情趣,更何况作家创作一部作品?精明的作家决不虚用、乱用一字一词,哪怕一个标点符号,也力求灌注他的感情倾向。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么?这一理论,我国的孔夫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已揭其序,而后更为历代诗人、作家、理论家所发挥,慢慢成为公理,被写进了教科书,被评论家、文学史家广泛应用,成为评价作家作品的一个

艺术准则。我相信,易教授在讲课如《狂人日记》和写学术著作时,也绝对不会违反它,而采用他们发明的“金童视角”理论。可奇怪的是,易教授为什么偏偏在与我争辩时,就断然否定它,理由只是认为它“多半是近半个世纪前流行的观点”,咬定我所说的《文学概论》教材“一定”是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出版的!古今中外哪有这种论辩规则?

我孕育30多年、因病后由多人与我共同写作、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生产原理》,他们大概没看,姑且不论;我院曾庆元教授于1998年出版的《文艺学原理》,是我校文学院系列教材之一,大概也没看,也罢了;那么,萧君和主编的1999年出版的《文学引论》,童庆炳主编的2000年出版的《文学概论》,王臻中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文学学原理》,吴中杰2002年出版的《文艺学导论》,也没有看么?这只是我顺手列出的几种,它们全是高校文科的教材,有的还是培养小学教师素质的教材,请易教授仔细看看,看它们是否含有被你断定只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加以否定的那种观点?你不看这些,竟敢下那种绝对的结论,这究竟是哪家哪派的学风?再则,在易教授看来,莫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就都是错的?这又是什么逻辑?学术争鸣能这样随意下绝对判断么?

(2)易竹贤教授无端指责我搞“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我答辩时指出这是常识错误:只有封建阶级才搞血统论,资产阶级是反血统论的。他辩解道:“我们给‘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打了引号”,“其意思是不赞成一段时期曾经盛行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本性表现的风气”。请问易教授,盛行那种风气是在什么年代?主要是“文革”中。“文革”结束并被广泛批判已20多年了,这种风气还在盛行,你能举出一二个例子么?易教授有什么必要还使用这种打引号的曲笔呢?即使认可你的“引号说”,那引号似乎也只应打在“资产阶级”四字上,而不应把“反动血统论”也打进去呀。易、陈一笼统都打进去,难道血统论不是反动的了?或反动血统论也不存在了么?无理强辩只会产生反效果。

(3)我在答易文中批评易竹贤教授善变,在学术著作中前后自相矛盾,主要举了他对鲁迅和胡适的态度为证。他辩护说,是我“肢解截取”,把他“拼接”成一个“善变”者了,并信誓旦旦“请读者看看原著”。现在我提请读者注意,先且不急找他的原著看,我只把在答易文中所引材料,再重述一二,请判断易教授是否善变?是否我“肢解”了他?诬陷了他?

易说他根本没有做过“落入俗套的批胡崇鲁的文章”,他的研究“本来就是把鲁迅和胡适摆在‘同等高度’来对待的”。那么,请问易竹贤教授:你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什么只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辈出的伟人中,“鲁迅是我最崇敬的一位”,根本没提到胡适?这是一。二是你说你对比研究鲁、胡,说了二人的“同”,也说了二人的“异”,意思就是摆在同等高度了。那么,你当时对比的最后结论是什么:鲁迅由进化论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崇仰者;胡适则“从怀疑而抵触马克思主义,一步步发展到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马克思主义所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至最后走向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这难道是你“本来”就摆平的“同等高度”,即你后来所说的鲁、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双子星座”!有哲人说过:笔写下的,斧头也砍不掉!你易竹贤教授居然敢大胆请读者看你的原著,难道当读者真的去翻看时,你可以马上魔术般地把这些话变没了?

易竹贤教授善变,自己似乎已毫无感觉了。不然,他就不会把原先他们提出的“《丰》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命题,一下变成了《丰》“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命题。这是一例。顺手再举一例:我在答易文中,还批评了《丰》在两性关系上“近乎反人伦”的描写,易文认为这只是“写得粗野一些”。我反问这种描写,“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么?”易二文辩护说,这“主要是一个创作风格的问题”,“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描写还是严肃的”。请看,原来也不得不承认的缺点,一下子又变成优点了,后语忘了前言,自己不断“颠覆”自己。这难道又是我“肢解”、“拼接”的么?

真不知易竹贤教授眼里到底还有没有学术规范的一点影子?

二

陆耀东教授对我 1999 年批评《丰》“近乎反动”，激动得二三年后站出来表示“不得不说话”，并特别声明，自己“1977 年以后”，就“力求实事求是地从事学术研究”了！他“实事求是地”说了些什么呢？说我“将不是政治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置别人于（‘近乎’）死地”，“伤及无辜”；说我“拿马克思主义作外衣”；说我“制造阶级斗争，甚至动辄挥舞政治棍棒，以文坛法官自居”；说我是在“花圃中驰野马”；说我“思想僵化”，将“成为学术界同仁前进路上的顽石”；等等。有读者说这纯是“文革”式的语言。确实读了陆教授文章后，感到他不仅大用“文革大批判”的语言，而且歪曲事实，不顾辩论规则，蔑视学术规范，竟比易教授还厉害。读者不信？请只看我以下论驳的几点。

（一）关于《丰》的思想性质，为什么不敢与我正面交锋？

陆教授说我对《丰》的批评是凭空“置人于死地”，“伤及无辜”。但《丰》怎么“无辜”了，却不见一字辨析。我在答易文中用了 3 000 多字，还是不完全引述《丰》中的描写，论证它从抗日战争的 30 年代到改革开放的 90 年代，几乎凡与共产党、与革命、与人民政府相关的人和事（包括火车站的女清洁工），大都用调侃、挖苦的笔调乃至敌对的情绪来描写，而对反对革命的人和事则多用庄严的笔调加以赞扬。我一再质问：说它“近乎反动”，过分了么？错了么？对此，陆教授为什么像易教授一样也不敢置一词？

陆教授正面回避，只好侧面反击。反击得怎样呢？请看：

（1）陆文中列了一节专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说文学有三类：第一类与政治紧密联系，文学问题即政治问题；第二类与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类纯文学问题。《丰》到底属哪类？是“纯文学”与政治无关么？又无一字交待。紧接着却大谈清朝文字狱和国民党及共产党执政后的文字冤案。他口口声声批评别人“武断”，强调对作品“要作细致分析”；然而，他对《丰》始终无任何分析，又无视别人的具体分析，就断言我的批评是“冤案”。而且我不明白，我个人对《丰》的批评，哪怕真的完全错了，怎么就成了一桩“置人死地”的“冤案”呢？

（2）大谈屈原和李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如何遭到维护“主流传统”者的“贬损、攻击”，并详细举证班固如何指责屈原。陆教授这样以古喻今，指责我对《丰》的批评，是否意在暗示读者，《丰》是《离骚》式的作品。《离骚》是中国最早的个人长篇政治抒情诗。它描绘了楚怀王时政治腐败、排斥忠良、人民受苦等黑暗现象，是不朽的名篇。这种暗喻不反而泄露了“天机”：在陆心底分明存在、但又不敢明说出来的对《丰》的性质的真实看法和评价么？指责我“把不是政治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不也是自己“颠覆”自己么？

（二）鲁迅几曾主张过作品不分好人、坏人？

陆教授说：何国瑞先生宣称，“对无产阶级成员，对革命者，可以写其非本质的缺点、错误，不可写成坏蛋，对剥削阶级成员、反革命分子，不能写其善良、偶尔的仁慈，更不能写成好人”。请问，我究竟在何时、何处、何文中，说过这样或哪怕是类似的话？我已一再论驳易竹贤教授对我的这种诬称，在我的驳斥下易不敢置一词，陆教授怎么视而不见，以为读者也就不见么？居然仍敢以这种“诬言”为据，大胆发表“我见”，完全支持易以人性的复杂性掩盖其阶级性，反对把人划分为好人与坏人的意见。如有“笔墨官司法庭”，这恐怕可判伪造证据“罪”吧？

陆教授不惜篇幅引鲁迅称赞《红楼梦》现实主义的 300 多字（正面辨析《丰》则不着一字），说它突破了“从前的小说叙述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以此来为《丰》辩护，并反过来批评我，要我把鲁迅这话“当做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是与非”来。首先，这对我，是无的放矢，或者说是硬绑“的”于我头额再来放矢。其次，陆教授甚至连鲁迅的话也没看懂，鲁迅的话并不是说《红楼梦》突破了以前小说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来叙述的写法，鲁迅的大前提首先是看到了《红楼梦》中写出了好人与坏人。第三，鲁迅这话反而正是照出《丰》的问题的一面镜子，《丰》所写的革命者、“公家人”几乎完全是坏，连生理上也尽如禽兽，哪有一点易和陆所主张的人性的复杂性？陆教授为什么会这样盲视《丰》、盲视鲁迅、盲视读

者呢?伟大的鲁迅,是不好随便被利用的,公正的读者也不是好随便被蒙蔽的。学术论争用蒙和骗的办法是绝不能取胜的。

(三)到底应怎样“与时俱进”?

陆教授说:我、易和他这代学人“所接受的文学观念,主要是苏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卢那卡斯基、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是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因此,过去往往“将文学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的观念就应“与时俱进”,言下之意,他和易已经抛弃了过去接受观念,而我仍抱着过去的观念不放,于是就要与易一起指责我“思想僵化”了。

与时俱进,完全应该。但如何进,过去的是否就要一概否定?且不说苏俄的“斯基”、“波夫”们的文学观念今天要不要全丢掉,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传给我们的文学观念也要统统抛弃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的主张(见《艺术生产原理》)。可有些人“文革”结束后,借批判“四人帮”之机,连马列老祖宗也要抛弃。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人不断盲目跟着西方“俱进”。有人不仅否定了斯大林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论断,也否定了列宁的《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还宣称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点进行“重新认识”,有人更宣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文艺界极左路线的总根子”,要彻底批判。有人大声疾呼要把文学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与政治脱钩,说文学是“纯艺术”、“纯审美”,“只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甚至说“文学是大便”;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中分正、反面人物,主张只写人性的复杂性和共同的人性;主张文学创作和理论“要与世界接轨”(易竹贤教授即持此看法),等等。

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阶级社会里,文学(作为总体,而不是每一作品)到底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在《歌》文和答易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论述。此前,我1962年在《艺术——征服心灵的武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2年第2期)、1979年在《阶级的文学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长江文艺》1979年第8期)、1989年在《艺术生产原理》、1991年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等论著中,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从人类文化学、历史社会学、个性心理学、文艺创作学等不同角度,并引证马克思有关论著及文艺理论史、文艺实践史等有关资料,也作过多次论述或论辩。易教授既向我挑战,为什么不敢引我一字一句,正面较量,陆教授照样如此,也硬把非我所有的简单化“工具论”强加我头上,还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说别人是“拿马克思主义作外衣”。请问陆教授,这是“实事求是”么?

为方便读者,我在这里再简述一下我的这一观点:人之所以能超出动物,就因人能制造工具,根据客观物种尺度和主体内在尺度的统一,来生产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以实现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在不断发展中的平衡。人怀着激情、目的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非自然存在的东西,无不是为人服务的手段(工具)。在原始社会,人们借助文艺力图支配自然,是人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工具。到阶级社会,人无不隶属一定的阶级,文艺家在创作中抒发其思想感情时必然体现某种倾向,以此去感染人、启发人应当如何生活,文艺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来阶级消灭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仍会有矛盾,文艺也就仍将具有工具的作用。陆教授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那为什么不剥掉它呢?

(四)当今还有没有阶级斗争?

陆教授只因我批评了《丰》“近乎反动”,就说我“制造阶级斗争”。且不说我个人“制造阶级斗争”之说是多么虚妄;我国当今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这倒是个必须辩明的大问题。

进入新时期后,党中央根据现实,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体指导思想。同时也鲜明指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某些领域、某些时候还会很激烈。这些年来,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严重斗争,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所引的邓小平的话,不知陆教授当年读过没有?现在请你仔细阅读读吧。

邓小平从 1979 年到 1993 年,相继提出并反复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严肃指出,文艺界“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扬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1](第 83 页)。他还具体批评了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说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起了近似的作用”^[1](第 17 页)。他责问:为什么在文化交流中,“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也不断输入?“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1](第 84 页)他一再提醒要长期反对西方对我们发动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要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第 325, 344, 379, 380 页)。按陆教授批评我的逻辑,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不也是在制造阶级斗争么?尽管邓小平如此反复、如此严厉批评之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错误倾向并没有停息,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宣扬抽象人性论,渲染色情的文艺作品仍在创作、传播,消解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腐蚀青年的心灵。1995 年刊行的《丰》只是这中间的一个典型例子。

(五)我何曾自命“一贯正确”了?

综上所述,陆教授为《丰》的辩护,对易教授的声援,实际是无力的,理论上虚得很。文章一开头,就揭我的“老底”,企图给读者一个印象:何国瑞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左”得很,至今仍顽固不化。谎言最怕事实,事实怎样呢?

陆文第一部分煞有介事提出:“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否一贯正确?”它引了我一段(也是全文惟一引的一段)如下的文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指出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不但没有抹煞,而且要求充分发挥文艺自身的特点。我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多次撰文宣传和捍卫过这种观点,今后我仍将宣传和捍卫它。”陆教授就据此断定:我这是自认为“一贯正确”了。然后,就又是“修正”,说我最早发表论文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而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又是揭“老底”,说当时“有位先生署名‘大波水’连续在《长江文艺》上发表”批判胡青坡的文章,认为胡的文章是毒草云云。

首先,陆引我的这段话,请读者仔细看看,含不含有学术上“我自命一贯正确”的意思?它明明说的是我在“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关于阶级社会的文艺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过去和今后的态度。所谓“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云云,就是上文提到的我从 1962 年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 2 期发表的《艺术——征服心灵的武器》到 1991 年在《文学评论》第 6 期上发表的有关论著。这里丝毫也没有涉及我是何时最早发表论文以及对自己学术活动进行反省的问题。我在与易等就关于《丰》的性质进行论辩时,有必要谈我学术活动的起止时间和功过是非么?请问陆教授,你来“修正”个什么?这样做,说穿了,是因为你正面无从交手,于是就不择手段,横找借口,乱揭“老底”,以为如此,就可置我于死地了。陆教授这种战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倒正好在读者面前暴露了自己:最轻是,连一般逻辑也不懂,一段普通的话也看不明白;若看明白了,就应同我“这种观点”正面交锋,把我驳倒,以证明我“这种观点”完全错误,是拿来披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陆教授为什么不敢这样做?今天我仍愿以“这种观点”向陆、易教授挑战:如你们能以事实、以理论击败我,我认输,我投降;但谁也别想要小聪明,用一点“歪招”,就能否定了它,就能说服了我。笔墨官司是靠以理服人的。陆教授该不会又认为我这是,不但自命过去一贯正确,而且自命永远正确了吧?要作论辩,就请遵守学术规范和辩论规则,使出真本事来!

最后,对胡青坡等进行批判的实情怎样呢?是当年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定调发动的。《长江文艺》一编辑受命找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指定要党员写文章,于是批胡的任务落到了我头

上。当时我觉得胡的文章有值得商榷处,但并不是毒草,于是作学术讨论写了文章。结果上面不满意,改成后来的样子。我没办法,只好把真名换成了“大波水”这个笔名。本来按常理,当时情况下,一般人都会乐意在省里第一把手面前表现自己,以期引起关注的,怎么还会把真名隐去,换上这么一个笔名呢?尽管如此,这个责任还是应由我承担。每念及此,总感内疚,感到自己还不是一个敢真正面对真理的人。

三

当今学术研究具有很好的宽松的环境。但是,学术界却存在一些很不好的风气:剽窃,伪造,伪造,浮躁,赶时髦,主观妄断,不引原文,不讲逻辑,不守规范,说一套做一套,个别的“大批判”遗风,等等。这些如不及时纠正,将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危害整个学术的发展。

陆耀东教授说:“1977年以后,我经常警惕……在学术上进行论争时,警惕出现‘大批判’……时刻记住王瑶先生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见解,但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再次声明,说得很好。可陆教授做起来呢?只因我批评了《丰》,只因我坚持了马列经典文论中某一观点,就说我“拿马克思主义作外衣”,“制造阶级斗争”,“以文坛法官自居”,“置别人于死地”,将成挡路的“顽石”……实在得感谢陆教授是在“经常警惕”,写作此文时一定更是“高度警惕”的情况下用笔的,否则,真不知还会有什么样的“炮弹”在我头上炸响呢?《丰》那样贬损、丑化革命者,难道只许对它唱赞歌、发大奖,不允许批评一下么?鲁迅说:批评家往往“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强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3](第336页)。我如实表现了我的爱憎,怎么就叫做“置人于死地”了?就叫做不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了?

我历来主张学术问题要争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国内多次学术会议上和几乎每门课中都要宣传我“打乒乓球”的观点:“学术争鸣可否学习乒乓球、排球的竞赛方法,在球场上不管是老将还是新手,是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子,只要一上场,双方就毫不客气地互攻短处弱点,谁攻得好,守得住,谁就取胜,大家都服他。正是这样,我国的球艺,世界的球艺,才进步得这么快。要发展学术,难道不能这样吗?谁亮出了观点,发表了文章,大家就可以攻其短,议其长,指名道姓,你来我往,彼此都把‘面子’丢到太平洋去,丢到茅坑里去,不做学术霸主,不做谦谦君子。只要这种局面一形成,在学术界,在全社会成了一种习惯,那学术没有不很快进步的。”^[4](第2页)看来陆教授倒是有点相反,既不尊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又似乎有点怕别人再说话。不然,怎么在他文章的开场白中就代为宣布:“《武汉大学学报》也似乎拟不再发表论争的文字”?

我实在弄不明白,陆耀东、易竹贤教授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丰》?我用300多字批评了一下,就引来易教授七八千字的辩护文,诬言相加,扣我政治大帽。我据实答辩了,就更引来了陆教授一齐上阵,把“拿马克思主义作外衣”,阻挡前进的“顽石”这类“大批判”的语言都甩到老同学头上了,把“文革”中红卫兵打派战时乱揭老底的手法也用上了,似乎非把我打成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不可。这究竟为了什么?《丰》真的值得你们那样来保护?鲁迅是中国的“民族魂”(鲁迅逝世时沈钧儒写的悼词),世界人民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这些年来被一些人攻击、诋毁得那样一塌糊涂,你们似乎现在也还表示崇敬他,却为什么不站出来,对这股毁鲁狂潮说一个“不”字呢?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在你们的心目中,难道《丰》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鲁迅么?难道中国革命、难道鲁迅真到了该“批倒批臭”的时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文艺界凡是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话的,往往就被指责为“左”。多年来,“左”帽已成了某些人手里拿着随时抛向敢于批评“自由化”和错误倾向的人头上的得手武器。一些同志不加细察,往往也跟着这样做,或加以认同。这就像当年有人随便给人扣上“右”的帽子一样。邓小平1983年就看到了这点,严肃指出:理论界、文艺界“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则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

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1](第 86 页)

今天,这种局面彻底扭转没有呢?有一个例子说明恰好相反。1996 年 6 月 7 日《钱江晚报》曾报导,一位曾经颇有名气的批评家,在他的《批评者说》一书的前言里,就宣告“自愿地从早先的批评营垒中退席”,以免被指责“锋芒毕露、苛刻地挑剔别人”。难怪易文一开头就说,像我这样地批评《丰》,“近年已属罕见”;而像易、陆教授那样地对我的批评,这些年来却是常见的了。这种“正常”与“不正常”颠倒的局面,正常么?

以上答辩,是否犯规,请读者鉴评。但愿我们这场辩论,不仅有利于对《丰》的正确评价,而且能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建设。

注 释:

① 关于美国对我国和平演变,可参见何国瑞主编的《社会主义文艺学》第 208—218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参 考 文 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论文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何国瑞. 艺门推敲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何坤翁)

Academic Argument Should Observe Academic Norm

HE Guor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E Guorui (1933-),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cience of art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Professor YI Zhu-xian et al. ignores the rules of academy, not daring to face head-on against Professor HE Guo-rui on the controversy theme they provoked. Professor HE has no interest in replying, only pointing out their caprice in academy. Professor LU Yao-dong dare not face head-on confrontation, and make no remark 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either, disobeying the criterions of academy execrably. At the same time, he rubukes “Big Breasts & Wide Hips” out of all reason, asserting Professor HE’s criticism to be “put unjust verdict and let others of fatal position and make class struggle”. Professor HE cited DENG Xiao-ping’s criticism since 1979 about the liberalization ideological trend of domestic literature and art field and wrong inclination in China, proving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class struggle. Why the three professors violate the academic rule and spare no efforts pleading for “Big Breasts & Wide Hips”? Is it really the time to deny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academic norm; seek truth from facts; class struggle